

马克思主义阶级与 —— 性别理论 ——

梁小燕◎著

*Marxism Class and
Gender Theory*

马克思主义阶级与 —— 性别理论 ——

梁小燕◎著

*Marxist Zhuyi Jieji
Yu
Xingbie Lilun*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曹 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阶级与性别理论/梁小燕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0

ISBN 978-7-01-018460-9

I. ①马… II. ①梁… III. ①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研究②马克思主义-性别-理论研究 IV. ①A81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63121 号

马克思主义阶级与性别理论

MAKESIZHUYI JIEJI YU XINGBIE LILUN

梁小燕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4.75

字数:210 千字

ISBN 978-7-01-018460-9 定价:4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该书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BSH109）”、
“湖南女子学院社会学重点学科项目的资助”

目 录

导 论	1
一、问题的提出	1
二、概念的厘定	9
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发展及特点	19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性别	29
第一节 马克思论女性的解放	30
一、实践唯物主义原则对女性主义的启示	30
二、劳动力再生产与女性的压迫	35
三、人的本质与社会性别	39
四、女性解放是衡量人类解放的标尺	42
第二节 恩格斯论女性的解放	48
一、家庭形式的发展与女性社会地位	48
二、社会性别分工性质的转变与女性的社会地位	52
三、阶级与社会性别之间的关系	58
四、建立一种以性爱关系为基础的新型婚姻	63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对社会性别分析的方法论意义	70
一、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与社会性别关系	71
二、历史唯物主义总体性思想与社会性别	74
三、作为权力关系的阶级与社会性别	77
四、马克思主义史上关于阶级与社会性别关系的研究模式	81

第二章 政治经济学语境下的阶级与社会性别	85
第一节 “家务劳动”的理论探讨	86
一、经典马克思主义对“家务劳动”的论述	86
二、无偿的家务劳动是女性受压迫的根源	88
三、家务劳动与剩余价值的生产	91
四、家务劳动辩论拓展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	94
第二节 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二元体系	97
一、作为特定结构的女性状况	98
二、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伙伴关系	102
三、作为阶级和社会性别合题的资本主义父权制	106
四、二元论的其他理论模式及其批评	110
第三节 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一元体系	113
一、父权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属性	114
二、“分工”对于分析女性整体地位的有效性	117
三、社会性别分工是分析资本主义父权制的核心范畴	119
四、女性的异化与资本主义父权制	122
第三章 多元文化主义语境下的阶级与社会性别	125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的变化	126
一、女性主义理论多元发展的理论背景	127
二、“多元化”融合到女性主义的历程	130
三、对同质性“女性”范畴的解构及其后果	132
四、适应女性主义多元发展的研究方法	136
第二节 后现代语境下的阶级与社会性别	142
一、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文化转向	142
二、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历史总体性理论	144
三、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	147
四、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对传统阶级理论的解构	150
第三节 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视角下的阶级与社会性别	153

一、在批判中建构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理论·····	154
二、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的权力观·····	157
三、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的知识论·····	162
四、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的发展观·····	166
第四节 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的阶级与社会性别·····	171
一、对自然贬黜与对女性压迫的统治逻辑·····	172
二、生态女性主义的有机世界观·····	174
三、生态女性主义对科学技术的批判·····	177
四、生态女性主义对全球化的批判·····	180
第四章 中国语境下的阶级与社会性别·····	184
第一节 中国革命危机时期的社会性别·····	184
一、五四时期社会性别问题的启蒙·····	185
二、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阶级与社会性别的探索·····	193
三、民主革命时期女性主义的历史遗产·····	200
第二节 社会性别与家庭日常生活批判·····	204
一、家庭日常生活批判是中国女性主义的迫切任务·····	204
二、家庭是社会性别权力的起源地·····	207
三、日常生活的内在性与社会性别·····	209
四、社会性别分工是女性日常生活家庭化的根源·····	213
第三节 中国社会性别问题解决的前景·····	217
一、构建一种新型的母职观念·····	217
二、女性的家庭日常生活与女性的解放·····	220
三、拓展市民社会中的社会性别研究·····	223
结语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中国化·····	227
一、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	227
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中国化的动力基础·····	230

导 论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社会的发展,性别(gender)^①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的问题。在国际舞台上,性别问题随处可见。政策分析家和政客们为了赢得女性的选票而关注性别差异问题;宗教激进组织以性别问题对抗西方的生活方式,为男女两性设置了严格的区分;发展中国家的女性已经形成了巨大的市场,或者成为廉价劳动力,或者作为性商品,或者成为互联网上的色情主体,等等。性别研究已经开始取得其学术地位,不但进入了社会实践之中,而且进入大学课堂,成为学科门类,社会性别主流化成为国际政治的重要话题。

西方女性主义思想作为一种现代化话语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进入中

① 关于 gender 的译法在国内女学界引起过争议。李小江认为,在西方,由于 sex 充斥了整个社会,因此,gender 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的性别在抵制 sex 的过程中具有进步性。正是通过以 gender 为话语符号,女性主义能够改造整个社会意识形态。汉语中的有“性”和“性别”之分,“性别”本来就是一个社会概念,是一种以自然为基础的社会概念,实际上就是 gender 这个词的意思。若把 gender 翻译成“社会性别”,明摆着是把自然/生理因素排除在外了。因此,她主张把 gender 翻译成“性别”。王政认为,中文的“性别”二字同样包含了我们自己的文化意义,用“性别”来指称 gender 不仅对我们的理解造成限制也会产生概念的混淆。在性的问题上,如果不是用社会性别制度和社会性别关系来分析现存的文化观念,而是用现存的语言,现存观念来作表述,那我们不仅不能打破无所不在的传统文化的网,还可能反而会巩固它。而“社会性别”这个词的好处是,两个词组是中文里常用的,不至于给人太大的距离感;两个词的组合却是以前从未出现过的,使人不能想当然地以自己的理解去套,而会产生一个问题:什么是社会性别?这种不带假设的提问是了解一个新概念的有利前提。但是,王政也指出,四个字的词组显得累赘,不上口,不利于流通。也有学者把“gender”翻译为“性属”,但是,这种翻译运用的范围不广。笔者倾向于王政的观点,因此,笔者在所使用的“性别”一词,具有旧瓶装新酒的意味,这个词语的内涵是认同王政的观点。

国,妇女解放问题参与了中国现代化进程,改变了中国的性别状况,推进了中国阶级的重构。在当时学者看来,中国要兴盛,就必须发展现代文明之精神;发展现代文明精神,就必须兴民权;兴民权,就必须开通民智。^① 开通民智就需要培养新国民,而新国民的培养又离不开女性的解放。这样,解放女性就成为改造社会和改造中国的一面旗帜。中国现代人文学科的创始人从不同的视角研究了女性问题,如陈东原从历史、梁乙真和谢无量从文学、陈顾远从婚姻制度、费孝通从生育制度、李大钊从社会革命方面对中国女性解放进行了有益的探讨,这成为中国女性主义研究的历史基点。在内忧外患的时代,女性解放问题以自明性纳入了阶级问题,实现了二者在中国的联姻。

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为西方女性主义思想再次进入中国提供了时代的契机。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成为时代的重要课题。早在1986年的“第二次全国妇女理论研讨会”上,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王大明同志指出,要用新的原理和观点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妇女理论。在这个会议上,李小江提出妇女理论研究要打破三个禁区:打破性的禁区,因为中国理论研究中呈现出对性的漠视;打破阶级禁区,阶级和女性不是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都可以并列的,无产阶级妇女只是妇女的一部分,不能包括妇女的全部存在和妇女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打破女权主义的禁区,西方妇女的解放道路比我们更有经验,不应将女权主义拒之门外。^② 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在于提出了如何重新审视性别和阶级问题,如何借鉴西方妇女解放的经验重构中国妇女解放的道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重组,阶级和性别问题成为中国妇女解放事业的一个理论和实践问题,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必须回答的课题。

(一) 阶级与性别在当代的分离

中国女性主义传统是一种变革社会的因素,它始终是和中国社会变革联系在一起。中国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为指导,指出女性问题的产生是女性经济地位变化的结果,是私有制和阶级压迫所造成的。因此,女性

^① 参见黄见德:《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导论》,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② 参见陶铁柱:《八十年代妇女理论研讨会述评》,转引自李小江、谭深主编:《妇女研究在中国》,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9—190页。

问题的实质就是阶级压迫和社会压迫,女性的前途在于实现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在法律上确立了女性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家庭中与男性的平等地位,并在实践中促进女性参加社会生产劳动。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认为,男女平等已经成为法律和社会的共识,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也标志着中国女性解放事业的完成。这样,在以男女平等和阶级为导向的主流意识形态下,女性问题受到了遮蔽。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中国女性自觉地认同了女性已经获得解放的心理意识。

然而,女性解放实际上具有两个层面:一是阶级解放,这与生产方式的变革息息相关;二是社会解放,即女性解放是随着文化的发展,女性自身的生存价值的被承认、被发挥而实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女性走向社会物质生产领域,取得了法律上的平等,但这仅仅实现了政治上的解放,女性的价值仍然没有建立起来。这是因为,只要父权制文化仍然占主导地位,那么,女性的社会价值便不可能得到彰显。女性只能按照男性生产方式塑造自身,才能获得发展的权利。对于全社会的结构变动来说,社会的物质生产、人的存在方式、心理结构、价值取向仍然是按照适合男性的发展而发展的,这实际上是强化了父权制文化。因此,中国女性的阶级解放是以男权为中心的女性解放,是以男性的说话方式来谈女性问题。中国女性解放的这种历史特点使得女性并没有形成女性意识。^①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女性主义的主题就是唤醒女性意识。这种对女性意识的唤醒在价值观上和西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相接轨。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使得女性面临着就业难和社会地位低下的生存困境,这就提出了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同女性解放的关系问题。中国女性主义认为,两性的生存条件与阶级解放并不具有必然的同步性;国家的现代化并没有必然带来社会性别制度的进步。这种认识使得中国女性主义的理论建构强调把社会性别研究从阶级分析中分离出来。

李小江从理论上论证了阶级与社会性别分离的合理性。她指出,“性别”和“阶级”同是人类的属性,却属于不同范畴。前者属于本体论范畴,是人的

^① 参见何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化哲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2—247页。

基本规定性之一；后者属于历史范畴，是社会生产关系演变的结果。^① 进一步说，社会性别问题与两性生理特征有着内在的联系，它的产生离不开女性的生育功能。而阶级分析仅仅分析人类的社会属性，它超越了人的自然性。人类的解放是把人的主体性解放出来。然而，人类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女性受困于其生育的功能而滞留于自然，作为自然的一部分成为男人征服和奴役的对象。因此，女性的出路在于发展女性的主体性。女性在发展主体性的过程中，不能以男性的价值为标准，而是要产生一种新的价值标准。这种新的价值标准应该建立在社会性别分析基础之上。由于性别是一个本体论的范畴，因此，社会性别是人类所具有的一种基本的规定性，它具有普遍性。当它作为一种分析工具进入人类知识领域的时候，它和所有的人类现象发生了关系，从而能够为人类社会现象提供一种全新的认知图式。再推理下去，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激进女性主义结论：社会性别的压迫是阶级压迫的基础和原型。在这种反思的基础上，中国女性知识分子开始了一系列分离活动。正如林春等人对中国女性主义分离主义的描述：在理论上，中国女性主义把女性解放从阶级解放中分离出来，“主张女性的性别认同，有意识地反对以阶级分析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的性别盲点”^②；在学科上，“把女性研究从传统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生产中分离出来”^③；在战略上，“把妇女运动从国家塑造和控制的模式中分离出来”，一些女性知识分子成立了自己的民间妇女团体，拓展女性的生存空间和塑造女性自我群体形象。“‘女性’成为一个与‘阶级’并行的独立的范畴，从而指出妇女解放不同于或超越阶级解放或消灭阶级的内容与目标。”^④

中国女性主义的分离运动与当时中国主流思想对女性主义研究的排斥密切相关，因为主流话语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对社会性别理论研究的忽视

① 参见李小江：《性沟》，三联书店 1989 年版，第 49—57 页。

② 参见林春等：《试析中国女性主义流派》，转引自邱仁宗主编：《女性主义哲学与公共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96 页。

③ 参见林春等：《试析中国女性主义流派》，转引自邱仁宗主编：《女性主义哲学与公共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96—97 页。

④ 林春等：《试析中国女性主义流派》，转引自邱仁宗主编：《女性主义哲学与公共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97 页。

导致了中国社会性别研究的空白,而现实的性别关系却提出了这种理论上的要求。刚刚起步的社会性别研究,一方面要破除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女性解放的阶级话语的独霸地位,另一方面又要寻找解释中国市场经济所产生的性别现象的理论框架,这双重任务并没有得到当时中国主流理论界的重视,这就促使女性主义借西学东渐的浪潮向西方学界寻找理论的支持。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中国社会性别研究的某些理论框架一开始就打上了西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烙印。

性别解放与阶级解放相剥离,标示了中国传统马克思主义从男性角度定义女性解放的弱点,因此,在这层意义上,它有利于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但是,这种剥离也带来理论上的困境:一方面,它取消了女性的阶级属性,并把女性从现实的政治经济的社会背景下抽象出来,从而难以在理论上彻底说明女性受压迫的现象;而且,如果把阶级解放的领域拱手送给男性,这只会使女性主义研究画地为牢,因为这将把女性主义政治目标同社会结构改革的事业分离开来,致使女性主义研究失去现实意义的根基。另一方面,它强调性别差异,容易导致本质主义的倾向,强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女性气质崇尚的思想,从而强化传统文化中社会性别制度,为反女性主义者提供了便利的切入点,这将给中国女性主义事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二) 女性意识与个人主义在当代中国女性主义中的兴起

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女性主义性别意识自觉的年代。中国女性主义在不认同“男女都一样”的性别话语基础之上,提出了一种“男女不一样”的新型话语范式。女性主义强调,女性的政治解放并不等于文化解放。女性的文化解放是与女性的生理、心理的独特性息息相关,即构建女性主体意识。荒林在《男性批判》的《前言》中明确提出了“重建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命题。她认为,作为中国思想解放运动和社会转型的产物,中国女性主义与其说是性别路线,不如说是个人主义的;当代意义的中国女性自我解放运动,是个人主义意识形态深化的必然。^①对个人意识形态重建的强调导致了自由主义女性主义

^① 陈骏涛、郭素平:《成长中的中国女性主义——关于性别的一次对话》,参见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性别研究网。

在中国的流行,同时,也导致中国男性和女性的二元对立关系。具体而言,这个问题包括如下层面:

第一,强调个人意识形态的重建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在中国的流行奠定了基础。

个人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的核心。自由主义认为,不注重个人利益的同时也就否定了人民自主的基本方面。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沿袭自由主义的理念,即人存在于世界上的目的与意义,必须由个人决定,而不是依赖他人的权威与意见,也就是说,个人具有自主(autonomy)与自我决定(self-determination)。对于女性来说,女性生存的目的必须以自我实现、自我潜能发展为优先。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在概念上强调个人主义以及自我优先,既反映了它的务实特性又反映了它的理念本身的内在局限性。例如,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注重走上层政治路向而忽视了对下层穷苦女性解放问题的探讨。

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来说,它的终极目标是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下层劳动人民群众。人民大众的解放绝不是原子式的个体解放,它是一种集体行动。在这种意义上,重建个人主义意识形态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颠覆。就中国文化传统来说,中国历史文化则具有集体主义的特征。在中国文化中,个体只是社会网络中的一分子,女性臣服于丈夫,丈夫臣服于王权,无论“女性”或是“丈夫”同样无独立的主体性,他们都是民族群体中的构成部分,而不是超越于社会的独立个体。这与自由主义传统的西方个体将个人意识、自然权利置于社会之上大不相同。中国人一向注重集体主义,将个人利益的追求置于对集体利益的追求之中,这样一种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源远流长,对现代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个层次上,重建个人主义意识形态有利于破除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个体的压抑。然而,中国绝大部分女性是生活在底层的女性,对于中国女性主义来说,它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方面,要继续坚持把广大底层女性的解放置于女性主义的中心论题,换言之,必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道路,亦即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又必须把个体从传统文化中解放出来,重视对个体利益的尊重。这样,中国女性主义必须扬弃自由女性主义的追求,重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女性观。

第二,强调女性意识的建构,可能会导致中国女性主义在男性与女性的二元对抗中进行理论探索,从而把中国女性主义禁闭起来,难以形成一种影响时代的社会潮流。

中国新女性主义一开始就面临着这样的选择,即中国女性解放是追求解放人性的女性主义还是强调女性特性的女性主义。他们选择的是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和激进女性主义理论,这样,女性与男性的差异性得到了强调。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女性主义还大量地使用了后现代主义方法以解构中国传统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正如王金玲所指出的:“后现代主义逐渐成为中国大陆女性主义的一种视角和方法,并大有力争成为中国大陆女性主义主流话语之势。”^①这样,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和激进女性主义成为中国女性主义的主导思潮。

在中国女性主义最强势的文学和历史研究领域,我们可以看到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巨大影响。在文学领域内,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女性主义对女性意识认识的偏颇,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中的“女性写作”。陈染、林白等人私人写作的目的似乎就是展现所谓的女性意识,她们特别注意对于社会意识等“宏大叙事”的排斥,这种女性主义倾向实际上是极端的激进女性主义在中国的表现。在文学批判中,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直接受制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它可以说是西方第二阶段女性主义主流话语的中国翻版,是对于男权中心主义“中国战场”的清理。^②在历史领域中,我们以李伯重对中国妇女史研究的评价来了解自由主义和激进女性主义在妇女史中的巨大影响。“不少妇女史研究者过分强调妇女史的特殊性,实际上是将其变成一个封闭的学术领地。……一些妇女史研究者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研究建立在一种两性对抗论的基础之上,而这种对抗论却是违背事实和逻辑的。妇女既然是人类的一半,那么她们与另一半之间的关系就不可能仅仅是一种对抗的关系。

^① 王金玲:《后现代主义:中国大陆女性主义面临挑战与颠覆》,《贵阳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② 陈骏涛、郭素平:《成长中的中国女性主义——关于性别的一次对话》,参见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性别研究网。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相互依存仍然是两性关系的主流,因为如果仅只是对抗,人类社会就不可能延续和发展。如果坚持对抗论,那么妇女史研究就与西方女权运动中的激进主张无异了。……如果妇女史研究以西方女权运动中的某些激进主张为指导,那么肯定不能说是科学的研究。现在的妇女史研究,其理论基础主要是19世纪西方的社会理论(如自由、平等、博爱等),同时又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然而,正如王国斌所指出的那样,19世纪的社会理论,在许多方面已不再可信。目前的不少妇女史研究,实际上是力图从某些外来的理念出发去重新构建历史,而未能从史料出发,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妇女的过去。”^①

由此观之,摆在中国女性主义面前的任务既要重新唤醒中国女性的个人意识,同时又要坚持中国马克思主义传统,对中国女性解放要进行一种具有中国视角的研究,拒绝照搬西方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和激进女性主义来透视中国社会性别问题。这样,建立一种具有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成为时代的需要,这是中国女性主义发展的光明之途。

(三) 中国社会转型提出了阶级与社会性别问题

中国女性主义是与社会转型密切相关的一种人文主义情怀,这是中国女性主义定位的一个维度。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的。它不但要求反对各种带有封建色彩的反现代化思潮,而且要求在吸纳西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现代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超越西方现代化的道路,创造中国特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如果要有效地辨别传统中带有封建父权制性质的文化因素,就需要以社会性别为透镜,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向;在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的过程中,如果没有本土的社会性别理论视角,就可能对中国女性发展带来损害,从而危害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

就中国改革开放现存的问题而言,其关涉性别问题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各个层次的女性问题之上。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中国的区域差异、城乡差异和阶级/阶层差异不断扩大,这些纵横交错的社会经济结构差异造成了群体间的

^① 李伯重:《有感于中国妇女史研究现状》,《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

错综复杂的差异性,而这些差异集中地体现在各个层次的妇女问题之上。广大的打工妹为了出卖廉价的劳动力承受着私人企业或外资企业的剥削;农村劳动力女性化的现象有增无减;服务行业女性化趋向增强;女性的性对象化在大众文化中不断凸显;白领女性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的呼声此起彼伏。这一切社会现象都需要中国社会科学者用社会性别与阶级的视角予以分析,并提出女性主义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有效答案。

在北京“95 世妇会”上,联合国把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确定为全球战略。中国在《北京宣言》中也承诺,确保在所有的政策和方案中体现社会性别观点;2005 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实行男女平等是国家的基本国策”。这一些政治的行动表明中国政府对社会性别问题的积极应对。中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中国改革开放是以实现人的总体性、人的全面自由解放为终极目标的,因此,人的解放和女性的解放是社会科学研究不可缺失的内容。

总之,阶级和社会性别分析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转型所提出的重大社会课题。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方面,社会性别分析起着思维变革的作用;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来说,社会性别分析不仅能够提升马克思主义应对现实问题的能力,并能使之具有国际视野,即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性别问题的研究作出应有的回应,从而发挥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改革的正确指导作用。

二、概念的厘定

法国大革命开创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新纪元,它将女性解放问题正式提交到人类事务的议事日程之上。女性解放在两个方面得到了阐释:一是劳动妇女解放问题,它作为一个有关公共利益的社会问题被提出来,并融汇在整个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革命事业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二是中产阶级女性解放问题,即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它由中产阶级女性来提出,并以争取教育权、就业权和政治参与权为重要内容。

20 世纪 60、70 年代,女性主义开始了第二次浪潮,女性主义理论开始爆

发。这一时期的西方女性主义思想的复兴与当时政治和经济的历史转型密切相关。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复苏,劳动力的需求量不断增大,由此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比率上升,市场经济中的社会性别隔离问题日益明显化;其次,女性的经济的独立性使得她们不再依赖父亲或丈夫生活,客观上允许女性对劳动力市场中女性低工资、低地位、差的职业前景等社会现象进行批评,从而挑战男性社会的统治地位;最后,西方新社会运动的兴起,尤其是公民权利和黑人运动,吸引了大量的女性。在运动中,女性通过自身经历,深深体验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缺少女性意识,由此,女性主义者开始关注性、身体、生育等问题,并把政治问题拓展到性政治领域。这一时期,女性主义形成了三大理论流派: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但是,正如美国著名女性主义学者童在《女性主义思潮导论》中所指出的,对于女性主义流派的划分是从他们采用的方法、角度和理论框架来作标签的。但是这种标签并非绝对的、固定的。对女性主义理论家进行分类有着研究方便的考虑。^①对于本书来说,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这一范畴的界定是不可缺失的部分。

(一)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定义

鲍晓兰在《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中是这样定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并“不完全是指引经据典地研究马克思或恩格斯关于女性解放的观点,经常用来泛指任何持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结构影响女性的理论的学派,还可能包括对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妇女思想的批判”^②。在这里,她是从宽泛的意义上来定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即狭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等任何使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来理解女性生存状况的女性主义作家都包含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范畴之内。狭义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也可称为传统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它

^① 参见[美]罗斯玛丽·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艾晓明等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1页。

^② 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5页。